

近代上海的天后信仰

高红霞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天后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上海是其重要信仰圈。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天后祭祀活动有官方与民间两种形式,早期两者互为促进;进入民国后,官方所建庙宇尚存,而官方仪式却不再举行,但民间的信仰活动仍有持续,尤其在沿海省籍移民中仍然盛行。闽粤商人是上海天后信仰的基本信仰群体,上海的闽粤会馆几乎都合天后庙宇与会馆建筑于一体。虽然上海其它省籍会馆祭祀天后现象不在少数,但在神偶供奉排序、仪式活动方式等方面与闽粤会馆存在诸多不同。就上海闽商而言,天后不仅是海神、行业神,还是乡神。天后信仰使大多数闽商会馆在同籍商人中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其中一些会馆在进入民国后仍具超越同乡会的活动能力,与天后供奉有关。

关键词:天后崇拜;天后宫;潮州会馆;三山会馆

中图分类号: K25;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3)05-0030-05

The Worship of Tianhou in Modern Shanghai

GAO Hong - x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Tianhou worship is one of Chinese important folk beliefs. As the important belief circle of the Tianhou worship, Tianhou worship in Shanghai had the official and the folk forms which at first promoted each other mutually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late Qing Dynasty to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no longer held the sacrifice rituals, only the official - made Temple constructions remained. And the folk worship activities still existed and affected especially to the coastal immigrants. Merchant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were the basic believers of the Tianhou worship, and nearly all their guild halls and chambers in Shanghai were the complex buildings which gathered the Tianhou Temple and the guild constructions in a body. Though many merch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in Shanghai also sacrificed Tianhou in their guild halls and chambers, their shrine orders, ritual activities and other aspect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Fujian and Guangdong's. To the Shanghai Fujian merchants, Tianhou was not only the god of sea and profession, but also the local god. Tianhou worship made most Fujian guild halls and chambers cohesive and affinitive between the native merchants, and Tianhou enshrine and worship made some of Fujian guild halls and chambers even exceeded native associations in the capacity for a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ianhou worship; Tianhou temple; Chaozhou guild hall; Three Hills guild hall

天后,是福建由人而神的三大祀拜神座之一,原型为良家女儿,名林默娘,经历代皇帝保封尊称为“天妃”、“天后”,也称“妈祖”。上海地区是天后的重要信仰圈,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文献中曾有“圣妃”、“天妃”、

“天后”之称。近年来,关于上海天后信仰问题的研究已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不少研究上海航运和贸易史、移民社团、上海民俗等问题的学者,也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出发,论及上海的天后崇拜现象。2002年9月,在松江

召开了“首届浦江妈祖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上海妈祖崇拜问题，诸如上海天后宫的历史沿革、上海的航运贸易与天后崇拜的关系、移民社团与天后信仰的传播等，进行了学术研讨，这是首次关于上海天后信仰问题的一次研讨会^①。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民间信仰研究》^②，对上海老城厢的天后崇拜历史进行了梳理。应该说，目前学界对上海地区天后信仰的出现及变迁的一般发展轨迹已有相当的论述，但天后崇拜是中国信仰圈非常广的一种民间信仰，近代上海的天后信仰活动究竟存在哪些特点，具有哪些与其它地区相异的功能？天后信仰的传播与上海移民团体究竟存在何种关联？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上海地方志、清人笔记和碑刻为主要资料，旨在梳理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天后祭祀活动的一般形式，考察闽粤商人在上海天后崇拜中的角色定位及天后信仰对上海闽粤移民社团乡族认同的特殊功能。

上海出现天后崇拜可追溯到宋代，第一个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天后宫在宋末。《松江府志》称“莆有神，故号顺济……松江郡之上海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珩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③据此可知，宋代上海已有天妃庙宇，咸淳七年（1271），任市舶司提举的福建人陈珩发起改地重建，历经19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才正式落成，名“顺济庙”，又叫“圣妃宫”，庙址在“相当于小东门外的面浦地方”^④（今南市人民路南、丹凤路东）。顺济庙当时有文昌阁、关帝祠、雷祖殿等建筑。元代以后称“天妃宫”。明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或限制民间近海作业和航运，上海的航运业随之衰弱，“天妃宫”也顿显冷清。1553年，上海为抵御倭寇而兴建城墙，位于城墙东北角的敌楼护军台正好筑于“天妃宫”上，庙宇建筑不得不拆除。但楹联被拓了下来，大殿的“丹凤楼”匾也被保存下来。倭寇平息后，上海士绅在万军台上重建庙宇，称之为“丹凤楼”，三层杰阁，成为上海的一个制高点，可望浦江林帆，从楼上眺望，浦江景色尽收眼底，端午观赏龙舟，重阳登高，于是“凤楼远眺”被列为“沪城八景”之一。清嘉庆十一年（1812），巡道钟琦倡捐资重修。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占据城池，丹凤楼毁损大半，后得住持凤朝阳募修，虽经三载而粗缮，但随后大部分建筑又被毁坏。

明清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更具有移民城市的特点，相应于宗教信仰方面，也体现了移民城市信仰的多元化、开放性特点。天后信仰只是众多信仰之一，据现有资料考察，笔者认为，上海天后信仰传播呈现官方

与民间两种形式，在民间还有着不同的祭祀群体。早期官方民间两者互为促进，进入民国以后，官方建筑尚存，官方的仪式已不再举行。上海官方的祭祀活动清代为盛，地方政府在天后信仰的扩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清雍正年间天后纳入国家祀典，乾隆年间更是规定地方官“春秋二仲月上辛日致祭”^⑤；二是清开海禁后，上海的沙船贸易日益兴盛，因此海神天后香火旺盛则成自然。开埠之前，上海官方每年天妃诞日的庆典活动非常热闹，其规模仅次于城隍出游的“三巡会”。清代上海人毛祥麟在《墨馀录》中对此有颇为生动的描述：“我邑岁于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辰，先期县官出示，沿街鸣锣，令居民悬灯结彩以祝。前后数日，城外街市，盛设灯彩。自大东门外之大街，直接南门，暨小东门外之内外洋行街（今阳朔路），及大关（即天后宫附近）南北，绵亘数里，高搭彩棚，灯具不断。店铺争奇睹胜，陈设商彝、周鼎、秦镜、汉匣，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兰麝伽南，氤氲馥郁，金吾不禁，彻夜游行。百里外舟楫咸集，浦滩上下，泊舟万计。名班演剧，百技杂陈，笙歌之声，昼夜不歇。十九、二十灯始齐，至二十四、五日止。……自道光辛丑，海疆多故，驻兵设防，因罢灯市。通商后，华夷杂处，恐生争端，遂以为禁云。”^⑥王韬在《瀛壖杂志》中也有记载：“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喧聒，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谓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⑦张春华的《沪城岁事衢歌》也说：“天后宫，明顺济庙也，由万军台移建于东郭外。浦滨重洋数千里，于海舶多著灵迹。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市人敬礼，灯彩特盛，虽乡村妇女，必往观焉，谓其地为‘宫前’。”^⑧显然，开埠以前祭祀天后是官方主持的一个活动，而且采

①此次会议与会论文，由《学术月刊》编辑部以专刊形式于2003年5月出版。

②范荧《上海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陈威等修、顾清纂《松江府志》卷15《坛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影印本。

④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⑤嘉庆《松江府志》卷17《建置志》。

⑥毛祥麟《墨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⑦王韬《瀛壖杂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⑧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取事先大张旗鼓地告示,民众则张灯结彩、赛会演剧以呼应,成为一个民众广泛参与的节庆日。

开埠后,天后神祇继续得到崇扬,原因在于这时的上海不仅埠际贸易和海外贸易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度成了中国官方、民间出访海外启程和返回的重要港口。朝廷派往国外的使臣,奉派出国考察工业技术、宪政、军事和订购战舰军火的官员,大多从上海启程。这些都成了天后崇拜得以盛行的基本因素。当年登船出海,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安全保障,生命托付于变幻莫测的大海,没有航海之神天后的保佑,多少会给漂洋过海的官员带来一种安全压力。1853 年小刀会起义,天后宫再度被毁。1860 年,法租界第一次扩展,占用小东门外 30 多亩地,天后宫的基地也在其中,于是,官商每年的祭祀曾改在商船会馆内举行。商船会馆最初由崇明籍沙船主集资创办,后来融入本地和各地的船商,之后被上海本地及宁波籍的船主轮番掌控。选择在商船会馆举行仪式,自然同沙船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关。沙船航运业曾经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清代前中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不但在上海航运业起步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领军作用,而且在清后期朝廷的海运漕粮、上海地方事务和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均有独特作用。商船会馆是目前上海有确切资料记载的成立最早的行业会馆,也是开埠之前上海最强势的行业组织,在上海各会馆公所中一度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上海县续志》记“商船会馆在马家厂,康熙五十四年沙船众商公建,崇奉天后。”马家厂即今南浦大桥浦西引桥下的中山南路董家渡会馆街一带。在远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里,船工出航除凭借经验行驶航路外,还有就是祈求天后圣母保佑,设立商船会馆最初动机就是崇奉天后,希望有个固定的场所举行祭祀仪式;另一个动机就是集众船商之力,应付突如其来的海上灾难,抚恤并安置船工及家属。这些都是为了凝聚同业的力量,抵御风险,振兴沙船业。

随着出使海外的官员越来越多,祈求在海上旅行中得到天后保佑的人也在增多。总将祭祀活动放在一个行业会馆中进行会有诸多不便。光绪五年(1879),出使俄国大使崇厚,奏请在上海重建天后宫,并建出使大臣公所,经总理衙门批准,在淞沪铁路车站拆毁后的近十二亩官地上,分别建了天后宫和出使行辕,于 1884 年正式建成,这时的“天后宫”成了外派官员祭祀天后的场所。其址在今河南路桥北堍,河南路桥以前也称“天后宫桥”或“天妃宫桥”。新天后宫占地 4 亩余。进宫为广场,前有头门对楼,戏楼,东西看楼,三进为中央大殿,大殿中供有神龛,后有寝宫楼。天后大殿面宽 5 间,进深 4 间,高 6 丈,梁柱雕刻精美,气势雄伟,系典型清代建筑。

此外庙内还有东海神坛。这里既为官方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平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及圣母诞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善男信女亦可前往祭拜,香火旺盛^①。

与其他沿海城市的天后庙大多由民间集资兴建不同,上海的这所天后宫为官方所建、政府出资。这在中国庙宇历史上是不多见的。1899 年,公共租界扩张,天后宫被划进租界。按照中美双方签定的《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天后宫与出使行辕是中国官产,不归租界管辖^②,这也是一市三治的上海又一奇特之处,城中有租界,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然而,租界中的庙产属中国官产,不缴捐,不受工部局节制。事实上,这种情况最终导致的是租界和中国政府都不能对天后宫进行有效的管理。

辛亥革命后,出使行辕被上海军政府取缔,改作了上海商务公所(后来的上海总商会)的办公地。政府不再举行任何祭拜仪式,但仍向民众开放,天后宫的香火大不如前,而摊贩、小偷、江湖郎中、骗子等各色人等却涌了进来。于是也出现过因管理而引起的外中争执。上海地方政府一方面募捐修缮,另一方面也想让香火日渐冷落的天后宫物尽其用,故在天后宫寝宫楼设立县立第三小学,戏楼和东西看楼则租给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由于天后宫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共场所,不少集会也曾在这里举行,1924 年 10 月 10 日,曾在此举行国民国庆纪念大会,右派行凶打伤上海大学学生黄仁。1927 年 3 月 21 日,李立三在天后宫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③。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其实质是限制寺庙扩大,初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倡导移风易俗,革除迷信的。在区国民党党部的帮助下,树基小学“将大殿的神像、器具或毁或赶出了宫门”^④。至此天后宫香火断绝,抗战时期虽有小规模复苏,抗战胜利后又归于冷清,其房产全部由树基小学租用。

二

晚清时期,上海除了在官方出资建造的天后庙宇中由官方组织祭祀之外,民间也有着一些不同的祭祀场所和祭祀人群。民国建立以后,官方所构天后宫建筑仍

^{①③}《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宗教志》第 2 编第 1 章第 2 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563 页。

^④《上海市教育局关于市立树基小学拔用天后宫大殿房屋及借用操场问题》,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 Q235—1—2221。

在,官方的祭祀仪式已不再举行,而民间自发的祭祀活动仍得到延续,尤其在闽粤等沿海省籍移民中,天后仍是重要的祀拜神偶,对上海闽商而言,天后的职能已超出了保驾护航的功能,乡土认同成为更重要的职能。

在晚清,官方组织民众祭祀天后的同时,民间也有祭祀场所,即会馆、公所。上海祭祀天后的会馆、公所不在少数,大多集中在一些沿海省籍的会馆。据碑刻资料统计,全市35所会馆、公所中,奉祀天后者达12所。在105所同业或同业兼同乡的会馆、公所中,将天后设为神座的占大多数^①。可以说,移民群体是民间天后崇拜的主要部分。然而在移民信仰圈中,神偶信仰也是多元的,不同省籍移民对于神偶祀奉的排序及方式各不相同。闽粤会馆奉祀天后与其它会馆不同,他们一般将天后供奉在主殿,并按时节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尤其是闽商会馆,设馆初衷大都为了远航登岸后祭祀天后。“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庇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此所为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②潮商的潮州会馆、潮惠会馆和揭普丰会馆也一律以天后为主要崇拜的神座^③。闽粤会馆一般每逢九月初九天后升天日、三月二十三天后诞日,会举行隆重祭祀仪式,且演剧酒宴持续数天。民国建立后,官方天后祭祀仪式停止,闽粤商人会馆的祭祀活动就更显突出。其它绝大多数会馆是将天后放在后殿或偏殿。如山东会馆将之供设在后殿^④。并且一般不见有规律地举行祭祀仪式的记载。可见行业商人们祭祀神偶的重要性排序不同。另外,不同场所所面向的信仰圈也不同。官产的天后宫面向所有信众,而会馆、公所的祭祀主要限于同籍或同业人士。

民国建立以前,对上海天后信仰的推广,虽然官方褒扬有倡导之功,但闽粤商人的信奉和传播仍然起最基本的推动作用。闽粤商人帆海抵沪的足迹很早,明末清初已形成气候。据现有资料,他们在上海创立的会馆公所时间上虽不是最早的,但整体上仍属于早期之列。上海最早的两所会馆成立时间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前期,它们是关山东公所和商船会馆。而18世纪上海成立的会馆有6所,闽粤会馆占据其二,即潮州会馆与泉漳会馆^⑤,前者为1757年,后者为1759年。广肇公所虽没有确切的创立时间,但1872年重建时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那么它的初创时间至少在1872年以前。就会馆数量而言,闽粤会馆要多于其他省籍商帮会馆,且每遇重大事件发生,潮州会馆、广肇公所、泉漳会馆、点春堂、三山会馆无一例外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会馆。据此,闽粤商人不仅是在上海活动较早的客籍商人,而且也是早期上海经济社会中有着比较突出地位的商帮。明清以降,闽粤商人所从事的行业在沟通华南与江南的经济联系,

导致上海日益商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外国传教士的估算,1851年,上海县城里的广东人约有8万左右,超过江苏人和浙江人;而福建人约有6万左右,名列第四^⑥。闽粤人在上海客籍人口中占有很大优势。这样的状况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发生了变化,上海的闽粤人口大为减少。然而,不久的1856年,道台吴煦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由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确立了广东人对鸦片经销的垄断权。这样,通过充当买办,利用与洋行的特殊关系,广东商帮成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商帮,直至1890年代,这样的垄断地位才被江浙商人所打破^⑦。

上海的闽粤商人在族群发展、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上海闽商中数量多、影响大的是泉漳商人,上海粤商中数量多、实力强的是潮州商人和广肇商人。潮州与泉漳地区同为闽南语系覆盖区域,泉漳商人与潮州商人同操闽南语,他们在族群的发展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少学者认为,在福建和广东部分地区操闽南语的族群为同一民系,称闽南福佬人,主要分布在华南沿海一带^⑧。福建的闽南人就是在广东的“福佬人”;广东的福佬人就是福建的闽南人。闽南语对其他地区人而言,是一种比较难学难懂的方言,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闽粤商人与客居地居民的沟通,而潮商与泉漳商人在交流方面没有丝毫问题。闽粤商人的宗教信仰也大体相似。他们同为天后信仰在江南地区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天后信仰虽非粤商和闽商的唯一信仰,但在上海的闽粤会馆中所供奉的神灵却基本相同。大多数的闽商会馆和潮商会馆中都是正殿供奉天妃,后殿供奉关帝。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妃生日,他们会举行隆重的庆典仪式。

天后首先是福建莆田的乡土神和保驾护航的海神。从上海小东门黄浦江边这座天后宫的建筑缘起和建筑位置亦可推知闽商对上海天后崇拜的示范作用。小东

①③⑤⑦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90、42、435页。

②《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236页。

④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页。

⑤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6页;《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59页。

⑧徐杰舜《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门外既是船码头,又是当时上海商贸中心,也是闽粤商人聚集地。王韬《瀛壖杂志》卷 2 记载“闽人乃于东关外建立天妃宫,古称顺济庙,颇巍焕。创自宋末,成于元初。海舶抵沪,例必斩牲演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①“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辰,灯彩辉煌,笙歌喧沸,大小东门一带为尤盛。闽粤富商无不殚其财力以奉神。金炉篆绕,所焚沈檀伽楠,氤氲馥郁,香彻数里。”^②其顶礼膜拜情景可想而知。邹弢的游沪笔记也记载:“天后诞,粤闽各商及海舶皆演剧伸敬。”^③进入民国,闽粤会馆的奉拜活动仍然颇具规模。泉漳会馆 1931 年前,最盛大的集会是天后诞日,每逢此时,馆内必定请戏班子,一边喝酒、一边看戏,狂欢场面延续三天。后由于斗殴事件发生才停止演戏^④。故民国以后闽粤商民是上海民间天后信仰活动的主要群体。

明清进入上海的福建人大多从事埠际贸易和水上作业,天后是行业护佑神。进入民国以后,在泉漳商人的行业结构已变化的情况下,仍崇奉天后依旧,这时的天后信仰已超越了行业护佑的作用,而更有乡土认同的情结了。所以上海的福建会馆基本上主殿都供天后。从 1757 年起,史料确切记载了闽商在上海建立的会馆、公所,其数量在老上海各省会馆、公所中名列第四位^⑤。它们除了发挥联络乡谊、救助同乡、协定商情外,都以天后作为会馆神祇,并且“合庙堂于会馆也”^⑥,故人们亦称闽商会馆为“天妃宫”。从晚清到民国,有资料可查的闽商会馆、公所至少有七、八所。现今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建筑为福建果桔商人所建的三山会馆,它的别称就是“天后宫”。最初地址在里仓桥。由闽人林克楷、王必麟、黄绍丛集资租赁里仓桥(今里仓桥街)民房设置,为了区别于在沪北的三山福宁会馆,故称沪南三山会馆。创始人均系福州农村经营果桔业的农民或商人。其宗旨是“同人聚会、联络友谊、举办慈善事项”^⑦。光绪末年,里仓桥房主收回房产,于是会馆又购得靠近南火车站土地另建。宣统元年(1909)开始抽厘集资重修,1911 年正式破土动工,历时五年方建成,外观颇为壮观,其址在现南市半淞园路 239 弄 31 支弄 15 号(今由中山南路 1551 号出入)。“祀湄州天后”,“神座南面,剧台北向,东西楼相对峙。”^⑧整幢建筑为传统福州地区大院建筑样式,占地面积 4.2 亩。

闽商会馆中最古老、最富丽堂皇的要数泉漳会馆,馆址在大东门外(今复兴东路与东门路之间、十六辅码头对面)的咸瓜街。根据解放后泉漳会员的回忆,在明末,泉漳两属中龙溪(今龙海,1960 年龙溪、海澄两县合并为龙海)、同安(今厦门市辖区)、海澄三邑海商已在上海建立会馆组织,至清初始建馆。原名“龙同海会馆”,因其主要是福建泉州、漳州两属中龙溪(今龙海)、同安

(今厦门)、海澄三邑^⑨“捕鱼者的远程住宿站”^⑩,故名。馆址并非在咸瓜街,而是在黄浦江上游的日晖桥(今南园)。早年黄浦江船只可溯江而上,停泊在日晖港,会馆便临港而设,占地约三亩。主要具有祭祀、寄柩、住宿的功能。航海作业,生命在风口浪尖上颠簸,求得海神天后的保佑便是头等大事,船一靠码头,就举行祭祀仪式,已成为旅沪福建船民必修的功课,故会馆中辟有天后宫。随着泉漳在沪商人的发展,渐渐觉得日晖桥距离当时的上海县城太远,往来多有不便,于是由泉漳旧属龙同海三县在沪 51 家商号、船主集资,在十六辅码头对面的咸瓜街建造了一座会馆,取名泉漳会馆,而日晖桥的建筑仍存其旧,作为一处别墅,因其在咸瓜街南面,故称“南会馆”。

泉漳会馆的神偶供奉方式很能代表旅沪福建移民宗教心态。泉漳会馆前殿供“天后”,帆海生涯,向天后祈福关乎生命和事业。第二进大殿供“关帝”,其意义在于“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桑梓,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⑪泉漳别墅则供奉“观音”,“以护幽灵,而资普济。”既有寄柩又有义冢,观音大慈大悲,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而祭祀天后则是泉漳会馆最盛大的集会。合庙宇与会馆为一体的建制,增加了会馆在同籍商人中的亲和力和聚集力。泉漳会馆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修缮,泉漳商人都 不惜巨资捐赠,使得会馆建筑富丽堂皇,活动经费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泉漳商人对于会馆的这种热情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出自对神偶的供奉,这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祈求天妃保佑以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一是出自在异乡客地的乡土意识。

通常人们将民国以后划为会馆发展(下转第 69 页)

①王韬《瀛壖杂志》卷 2,第 33 页。

②王韬《瀛壖杂志》卷 1,第 13 页。

③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521 页。

④蔡杰东《泉漳沧桑话》,上海泉漳会馆编辑部编《泉漳特刊》1948 年 4 月,第 11 页。

⑤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 880 页。

⑥⑩⑪《兴修泉漳公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 236、235、236 页。

⑦《三山果桔会馆》,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 Q118—1—5。

⑧《建创沪南果桔三山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 359 页。

⑨黄则盘《上海泉漳会馆沿革及抗战时期活动》,《泉州文史资料》第 13 辑,第 63 页。

见很深,各有传统。各派都想利用中训团发展势力。”^①在每期集训中,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均在训练单位频繁活动,以扩大其特务组织,并利用训练分化地方异己势力^②。

第三,国民党的严重腐败。专制制度下,政权失去人民的监督,故腐败严重。在干部训练中,道德训练、精神训话的官员要求受训学员信仰“三民主义”,遵循“四维八德”,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官员贪污腐化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总体的严重腐败,使得学员对政治与实际严重背离的训练持抵触心理,干部训练中的空洞说教根本无法扭转国民党整体的腐败形象给学员形成的既定意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6BZS026。)

作者简介:房列曙(1951—),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文心珏《中央训练团派系活动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派系纷争混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4页。

^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6辑下册,第739页。

(上接第34页)的衰弱期,然而泉漳会馆发展虽经晚清民初的政治动荡和淞沪战火的重创,其规模和影响仍居同时代会馆的前列。有两条资料为证:一、1947年泉漳会馆地产收益记录,具有地产收益的房屋有72幢,空地4块,散布在南市各处。直至1952年,泉漳会馆全年房地产收益仍达旧人民币44000万元(约合折实单位8万余份)^①这在当时的同乡团体中并不多见。二、1947年的《本会馆一年来大事记》^②全面显示出40年代末会馆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从大事年表中可知:会馆一年召开了1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平均每月1次,全体会员大会2次,并继续征集同乡登记入会,说明它的组织机构稳定,而且在有序地发展;一年举办了2次规模较大的聚餐会,并对会馆设施进行装修、筹划新公墓的开辟等,显示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对涉及18家公司的纠纷案调解成功,还就暨南大学处分同乡子弟事宜发表意见,年度救济过境贫困同乡2344人次,金额达1430多万元^③,凸现出会馆在同乡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泉漳会馆,即使在经历了战争后仍具有较强的恢复和维持活动的的能力。这是同时期许多会馆都不可企及的。因此,泉漳会馆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这不能不说天后信仰在其中产

生的作用。

综上,在民国建立之前,上海的天后崇拜出现官方组织祭祀,官方出资建造天后宫现象;上海的移民群体中,沿海省籍移民主要是闽粤移民供奉天后并热衷于祭祀天后的活动。官方的动员和民间的积极参与,使天后崇拜既是一种民间宗教活动又成为一种民俗庆典。闽粤商人是上海天后信仰的主要传播者,与此同时,天后崇拜也使闽粤商人更具凝聚力,这也成为闽粤会馆发展到民国仍然具有相当的实力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上海商帮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1YJA770007。)

作者简介:高红霞(1959—),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方英

^①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制作《房地产史料》,“上海建设网”,网址:<http://www.shucn.sh.cn/zt/hvsl>。

^{②③}《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58、59页。